



道安大師對中國佛教教育之貢獻

「在中國佛教史上，初期的高僧，當以佛圖澄、道安、慧遠三人为最偉大。但這三位大德中，在構築中國佛教教育基礎上，最具功績的還是道安。道安乃師佛圖澄以咒術教化民衆，深受後趙王石勒、石虎的誠摯尊敬，創建了八百九十三所以上的寺院，培植了民衆的佛教信仰，功績可謂卓越，但於佛典的真實現解，當推道安爲第一，道安却始終以一世師表加以敬仰。生存在亂世時代，猶能教導數千僧徒，興隆佛法，注釋佛典、編纂經錄，釐定儀規，開創了佛教史的新局面；而其遺業及至後世亦深受影響，道安可算是中國佛教界的空前偉人。」

自佛圖澄、道安、慧遠這三位的戒品嚴明，慧炬炳盛，嚴格守持戒律；而且智慧卓越，推崇他的餘芳將輝煌到千載後世。魏書釋老志稱道安歿後，經過二十餘年，鳩摩羅什纔來至長安譯出經論，述謂：

「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，符會如一。初無乖舛，於是法旨大著中原。」

足見於經典的理解方面，道安是一位非常卓越的高僧。

身世傳記

有關道安的傳記，除了道安自己所撰寫的經序以外，最爲基本的資料就是出三藏記集的道安傳。出三藏記集的作者僧祐，根據道安的綜理象經目錄，整理道安以後的翻譯經典而編纂目錄，那就是出三藏記集，而此出三藏記集中採錄了很多篇道安的序文，因此，僧祐所寫的道安傳記，是道安傳中最古老之作，也是最可採信的史料。

道安出生於常山扶柳，常山在今河北正定縣南；而扶柳則在河北冀縣西南六十里，可以視作是正定縣的南方出生。至於出生的家世，代代爲儒者，道安幼年時代，因爲早失父母，由外兄孔氏撫養，推斷其幼年，想必即有很不幸的遭遇。七歲能通五經文義，讀書的情形是，「一經再覽即可背誦。」十二歲出家的道安，因爲容貌不佳，不爲乃師所重，驅使往田間耕作達三年之久，但他仍勤勞從事，毫無怨尤，服事於勞役，愈益有感於道安爲人的堅毅不凡。

一直在農村勞作了數年之後，向師父請願求經，師父就把一卷五千餘言之辯意經交給他習讀，辯意經就是長者辯意經，亦名辯意長者經。道安利用空閒習讀此經，到了傍晚，把原經又還給師父，要求更換其他的經；乃師又以近萬言的成具光明經交令習誦，道安將此成具光明經和以前一樣，只花一天的時間，到了傍晚即可背誦，並又還經予師，師父不免懷疑，令其背經來聽，竟能一字不遺背誦一過，師父因而大驚，深自肯定了道安的才能。

從學時代

西陽城西三十里），當時有雁門（山西代縣西）沙門支曇講、鄴都沙門竺僧輔誰逃避來獲澤，共同協力從事研究道地經。竺僧輔是天竺人，持戒行，學諸論，通象經。時逢西晉滅亡之亂，與道安一起歸隱獲澤，研精辯析。在此獲澤避難之時，偶爾也相與晤面的還有太陽竺法濟等人，共同研究陰持入經並撰著注疏。在獲澤，道安與竺僧輔、竺法濟、支曇講這些學者們都是爲避難而逃。

來晉山護澤的。

道安會晤佛圖澄，是在石虎移都於鄴的三三五年，佛圖澄住在鄴城內的中寺，當時佛圖澄已一百又四歲。道安在三三五、六年即二十四、五歲時遇見佛圖澄，乃師一見道安甚為感歎，相與談話及終日。大眾見於道安容貌醜陋，都加以輕蔑，佛圖澄告誡大眾說：「此人深具見識，遠非汝等所及！」

道安師事佛圖澄之後，認真地研究經論，佛圖澄每講演經義，命由道安再加以覆講。

三四九年石虎死，佛圖澄在這一年，以一百十七歲示寂。道安大概是在這十三、四年以前從學於佛圖澄座下。佛圖澄不會翻譯過佛經，但能把握經論的大意而加以講說，充分顯示其卓越的才智。道安在佛圖澄門下，領受教益最深遠的該是戒學素養的深刻。

道安在鄴的時候，即曾學律，由於世局紊亂故而未能盡其所學，深以為憾！依此亦可推斷道安是在佛圖澄入寂的數年以前，在鄴都師事於佛圖澄。

教學化導時代 高僧傳讚歎道安說：「宗匠雖邈，應尋玄旨，窮究幽遠探微奧，季末宣揚無生理，流遁之徒歸向顯本。」到處遊方問道，四出訪求經律。在此混濁惡世中，宣揚佛教的無生真理，給一些精神放浪的人們，賦以探究本源的強烈使命感。因此，道安才啟程走向訪求經律一途。太行山脈中的護澤或飛龍山的避難修學，也許都是最方便的地方。

石遵即位於鄴都是在三四六年的五月到十一月之間，也是道

安三十八歲的時候。石遵派遣中使竺昌蒲去招請道安入華林園，並廣建房舍。道安此時正在山西、河北一帶遊方名山大川，然後似是應石遵之請進入華林園。擔任石虎的軍師。

道安住恒山時，武邑（河北武邑）太守盧歆，聽說道安的戒行清高，託沙門敏見邀請道安講經，雖然道安一再地固辭，但盧歆的邀請甚堅，後來道安終於開講。此時道安於經典的研究，已經頗具實力。這次的講經，深得道俗的歡迎和讚美。

道安一時又回到河北冀州地方，住在受都寺，集聚了數百弟子大弘法化，開始教育僧徒。此時的道安，名聲頗高，因此很多

弟子都紛來座下從教。

在這裏的教育僧衆生活，因為遭遇到冉閔之亂，道安向大眾宣布說：「今有天災，並有蝗災，盜寇所到之處，橫行跋扈，大眾若欲集合修行，生計難立；散開則無從修行！」因此，道安不得已乃進入王屋的女杌山，但王屋（山西垣西縣東北百里）的女杌山亦非安住之地。從此女杌山往南走，渡黃河，往陸渾（河南崇縣），這裏因為天災與旱魃缺乏糧食，所以導致「山棲木食修學」的處境，後來突然間慕容俊率兵迫近陸渾，只好再向南方襄陽而行，於是先取道新野（河北新野縣南）。新野縣也不是太平的地方，因此道安向大眾說：「今遭遇荒年，如不依國王則法事難立，普施教化自必廣弘流布。」大眾答說：「謹依法師之言實行！」因此，道安命竺法汰去往揚州，那是因為揚州君子多，好尚風雅與禪；請法和入蜀的山水之地，以便安靜地修行，作了如此地安排。道安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直奔襄陽，啓程想往揚州的竺法汰與弟子曇一、曇二等四十餘人沿長江東下，到了陽口因為罹疾而停住下來，在此，桓溫統治著荊州一帶，遣使送湯藥供養竺法汰。道安派弟子慧遠去荊州探視竺法汰的病情。

道安的同學法和從新野入蜀。據高僧傳卷五釋法和傳，法和是榮陽（湖北道縣北）人，自幼即與道安同學。因為他是「以恭敬知名」具備謙讓淳德的人。依道安之命，為了保全教團的分散，乃率領徒衆入蜀，在蜀地享有盛大的德望。後來聽說襄陽陷落，又從蜀地出往長安，住陽平寺，其後又與道安同往僧朗的金輿谷。

繼續苦難旅程的道安，自與竺法汰、法和別後，帶領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渡河，終於到達襄陽。

道安率領數百門徒來到襄陽，於此想尋覓一處能收容數百人修行的道場，該是此刻的當務之急。

道安等人最初會住過原有的白馬寺，因為白馬寺太過窄狹，亟須建築一座新寺院，以應迫切的需要。因此才有新造的檀溪寺的創建。水經注卷二十八汎水條上記有：

「北逕檀溪，謂之檀溪水，水側有沙門釋道安寺，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。」

襄陽豪族習鑿齒風聞道安的名聲，主動地致書通好。習鑿齒對於道安的學德，與其教團遵行戒律的生活規範，深為敬佩與感歎，在他致書與建康宰相謝安的信中，提到此地有道安法師者，是一位非常傑出的高僧。他領導數百弟子舉辦講會或齋會孜孜從事。却不以神通或方術去驚惑人的耳目，亦未曾以重威或勢力去整治羣小，而師徒們肅然互相尊敬，洋洋濟濟地遵守著規戒的生活，自己還從來未曾見過這樣的教團呢！這位道安法師通達內外羣書，亦精嫻於陰陽算數，於佛經的教理自是隨意優裕，於法義方面如同法蘭、法道等之所傳，充分流露出習鑿齒於道安是如何地敬重。

建元十五年（三七九）前秦王苻堅常言：「襄陽的道安是名器，朕將得而輔之。」三七九年派遣苻丕攻打襄陽，俘虜了道安，把他請到長安，住在五重寺。當道安離開襄陽的時候，隨即把慧遠等諸弟子分散令往江南，自己則去長安。雖說把弟子分散，但在長安五重寺，却又匯聚數千僧衆，大事弘揚佛法，充分顯示道安的德行宏化的偉大。後來在戰事中苻堅獲得了道安，苻堅向僕射權翼表示：「朕以十萬之師，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又半。」權翼問說：「那是什麼人呢？」「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！」相回答。這是向世人表示對道安與習鑿齒的評價。

道安在襄陽前後住了十五年，從事演講放光明般若經。這部放光明般若經就是朱士行去于闐所求得的梵本。

長安時代

東晉太元四年（三七九）二月前秦王攻擊襄陽，道安、習鑿齒和襄陽太守朱序都被虜送往長安。苻堅之於道安的禮遇，還約與道安同乘輦輿；權翼對此諫議說：「天子之駕，侍中可乘，出家剃髮的道安，不應同乘！」苻堅對此勃然作色說：「尊重道安法師道德，朕以天下不易，輦輿之榮，未稱其德！」表示道安的仁德應予尊敬，縱以天下亦不與易，與其同乘輦輿的榮譽，也不能與道安的仁德崇高相比擬，可見其對道安評價之高。並且尚命令僕射權翼扶持道安登輦，苻堅之尊重道安，竟至若此。

道安不但精於佛學，亦於詩詞，內外典籍、陰陽、冥數等學

問亦頗通達，為此在長安的貴族，也有為學詩而去親近道安，大家都覺得：「學不師道安，於義難中。」道安來長安的四年中間，每年演講放光般若經兩次。

前秦王苻堅不聽道安的諫言下令晉攻東晉，大軍在淝水交戰敗陣下來逃回長安，但被慕容冲所攻殺，當時道安正在城內，道安與弟子法遇等同在彌勒像前發願，願生兜率天上，道安自早即有往生兜率的心願，當其入寂，尚在彌勒之前求願往生。

身教示範 道安有位弟子名法遇者，其在江陵長沙寺弘法時，對飲酒而不焚香的僧衆，未加懲罰，道安知悉此事便遞過一根內裝木杖的竹筒，法遇了然於道安的心意，於是，集聚寺內的道俗，在大眾的面前，命令維那舉杖擊打自己三下，因而垂淚自責。

在很多的道安弟子羣中，僧傳中列名的也只十多人而已。蓋即：慧遠、慧持兄弟以及曇翼、法遇、曇微、曇戒、道立、慧永、曇邕、道願等人；在此之外，與道安的同學法汰和法和等實際上可以說是道門的門下，他們受道安的感化，在傳記上很明顯地看得出來。

在十名卓越的弟子中，堪以繼承道安的遺志者，當屬慧遠。慧遠經常都是衆學弟的上首，在襄陽陷落以後，同弟子數十人齊往荊州上明寺，後又移住廬山。慧遠實際上專心致力於道安研究的戒定慧三學大成者；也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在整體方面的基礎，都是由他所確立的。

此外，道安的弟子中，還有在荊州地方佈教的曇翼、法遇、曇微等三人。由於這三人的努力，使得荊州的教化，得以納入道安的門下，其後於荊州佛教的發展，盡致了很大的貢獻。

經典的註疏與目錄

道安生當一個戰禍頻仍的亂世，於不斷地逃難之餘，尚須為從事修行與弘法盡致心力，培育了慧遠以下很多門弟，也教化多數的在家信徒，同時還致力於建造寺塔。中國佛教的最初期，在經典翻譯方面雖然做得相當有成就，但古譯却經常發生謬誤，反而把經典中深奧的教義失却，也有部

分意義未能充分通達，因此在演講古譯經典時，經常都只是採擇經典的大意或是依文轉讀一番而已，蓋即於經典意義沒有正確的了解，只是出聲讀誦罷了。

佛教學者如道安者，亦以慨嘆的態度，由本身立志，探究經文的真義，闡揚深奧，以發揮經典的實義，而致力於經典的註釋。有關道安註釋的經典目錄，計有收錄在出三藏記集卷五（大正五十五·三九中下）的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。

於佛典所加註的註釋，在歷史上是罕見其例的。實際上道安於中國佛教史，稱為註釋佛典之祖，該是當之無愧。誠如出三藏記集作者僧祐所說：「明古之經義，實由安始。」

道安不但著作經典的注釋書，還撰寫了很多的序文，敘述經典的成立過程及譯出情形，乃至經典的解題，各就經律論發表自己的見解。他的經序，都收錄在出三藏記集的經序中，計有安般注序等十五種。

每當閱讀這些序文，深知譯出佛典是如何地熱誠盡致；在翻譯方面，又是如何地專心貫注。從來的翻譯家，在翻譯技巧上，並非每一位都未臻成熟，他們之所以對譯文難解的原因，無非是嫌其梵文的質樸，往往都勉強改適於漢語，因此反而失去了經文的原意。

道安每於外國僧的翻譯，必與弟子法和詳為校正其文字，務使經文的意義真實。

道安就有關翻譯工作的困難，舉列五失本三不易，以促進翻譯家的注意。有名的五失本三不易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抄序中之所敘述。

當初於經典的譯出，並無若何計劃。各代歷朝陸續來華的西域沙門和居士帶來的佛典，完整與否？亦無若何區別或整理，順手隨便翻譯，因此譯本極為雜亂，不但譯本未具一定的體裁，就連譯出的人或時代，亦都不盡明瞭。職此之故，博覽強記的道安，檢索譯經的時代，乃至譯者，判別經典的真偽，完成了目錄的編輯工作。

道安這項綜理衆經目錄早已散佚，現在已不復見，但從出三藏記集第二到第五之間得以窺其內容與體裁，吾人以為僧祐出三藏記集中的經錄是現存經錄中最古老的，特別應加珍重。假若沒有道安的綜理衆經目錄，恐怕僧祐也絕對無從整理出這項經錄問世。

教團規定的制定 道安不但致力於經典注釋或目錄編纂等學術研究，在制定教團戒律方面也開拓了新生面，道安認為戒律是得道的基礎，戒律在三藏中佔居首要的地位。

道安為了規範教團的秩序，致力於戒律的整備，著有僧尼規範一傳，因為現已不傳，故而無從了解其內容。因為慧皎曾在高僧傳上記述如次，當可約畧加以推斷：

「所制僧尼規範，佛法憲章，條為之例，一曰行香定座上講之法；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；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。天下寺舍，遂則而從之。」

上述的內容雖然不盡明瞭，但從宋贊寧的僧史畧簡述如次：「一者行香，定座上講；二者六時禮懺；三者布薩等法。」這是道安制定的講學儀規。

有關道安的整備僧丘戒律，在祖琇的編年通論於僧尼規範以外，舉有法門清式二十四條，並亦以之為道安的著述。另在義天的教藏總錄第一卷，並載有道安著作的四時禮文。此外，道安並創制倡行僧衆的釋姓，因為在此以前的中國沙門，都是從其師姓或國姓，雜亂無由，在道安的主張，佛教徒的本師是釋尊，為佛弟子者，應一律以釋為姓。因此後世的佛教徒在古字上都冠以釋字，以故，人稱道安為釋氏，或稱釋和上。

綜觀道安的一生，雖然生逢亂世，猶能積極於聖教的宏揚，尤其於中國佛教，在培育僧才，綜理典籍，注釋經義，序論佛經集成的因緣，縷述漢譯佛典的脈絡，以及制定僧團戒規等的偉大貢獻，使得中國佛教的根基得以鞏固，為千秋萬世的後進，開啟了康莊大道，其豐功偉業，足與儒教的孔聖相媲美，譽之為中國佛教的萬世師表，彌覺允當。